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0)01—0045—03

# 民居神龛内容历史变迁的文化学透视

李 琦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电气信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在对民居神龛内容历史变迁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反映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的裂变并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予以透视。

**关键词:** 神龛; 宗教; 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在住家厅堂正面设置神龛, 是中华民族一个传统久远的文化现象,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民族间却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最近, 笔者对湖北省黄陂县石门乡平峰村农户家的神龛进行了实地考察。平峰村地处大别山南麓西端余脉, 地貌属较为闭塞的丘陵地带, 占地面积约 333 公顷, 其中约 256 公顷为山林覆盖, 现有 11 个村民小组。自解放前至今, 随着历史的变迁, 该村农户家神龛的地位及内容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 并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文化现象。这种变化大致历经了四个阶段:

(1) 解放前, 平峰村家家厅堂正面设有神龛, 上书“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位”, 摆设神佛三尊: 左观音、中罗汉、右土地(如图 1 所示), 家家早晚磕头朝拜, 逢初一、十五或是清明、中秋、重阳佳节, 净手沐身, 烧香拜佛, 十分虔诚。

(2) 解放后至“四清”运动前, 30% 的农户放弃了对神的信仰, 70% 的农户保留着神龛及烧香朝拜的传统。

(3) 1966 年, “文革”开始, “破四旧、立四新”, 所有的神龛被砸烂, 在原有神龛的位置摆放着毛主席石膏像及语录, 厅堂正面贴上了毛主席画像。

(4)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至今, 平峰村农户家的神龛, 又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观

天地君亲师位



图 1 神龛牌位

音菩萨等神像又悄悄地摆上了平峰村的神龛。这四次变化, 是由三次不同的文化变革所造成。

## 一、“解放”的冲击——宗教信仰渐趋动摇

解放前, 对宗教和神的信仰在平峰村民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是因为, 作为“自然的人化”的人类文化发展程度, 总是受到人类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大小和改造世界的手段高下制约的。或者说, 经济基础决定了赖以产生的意识形态。解放前, 平峰村民在经济上一无所有, 两手空空, 面对自然界的淫威以及社会上层的剥削和压迫, 深感无能为力, 不得不将自身的幸福寄托于那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种种“神灵”的庇护和保佑。“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1]</sup>。当社会无法忍受政治、经济的全面动乱, 同时又找不到现成的精神、道德的避难所的时候, 虚无缥缈的宗教迷信及神话传说, 便成为社会成员, 尤其是社会下层的需要。这时候的平峰村民, 将自己难以把握的命运托付于神灵的庇护之下, 认为生老病死全是神灵对命运的安排。因此, 家家烧香, 户户拜佛, 希冀以心灵的安慰来抚平现实的苦难。由于解放后移风易俗对迷信的冲击, 使平峰村的宗教观念渐趋动摇。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引起了平峰村人活动方式的改变, 接着活动方式的改变又直接影响到平峰人的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

恩格斯在1845年至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sup>[1]</sup>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他们是什么样的”，意为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生产什么”，是指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容，即指实践中所组织起来的客体对象之间广义的因果关系，这种内容决定思想认识的内容并与其一致。“怎样生产”，是指生产活动的形式，即实践活动本身的结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思维方式并与其一致。结论便是：人的认识水平（认识内容和思维方式的统一）由物质生产发展的水平所决定。“解放”的冲击，使平峰人分得了赖以谋生的土地，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活动方式的改变及生产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平峰人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使平峰人感到给自己带来幸福的是“人”而不是“神”，虔诚的宗教信仰渐趋模糊而动摇。因而，从解放后到“四清”运动前，30%的平峰人自动放弃了对神的信仰，这一时期历史所呈现的，是天的权威的动摇，是神的地位的沉沦，是人的力量的迸发。现实动摇了平峰人对于神圣天道的崇拜，逼迫平峰人修正传统的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来为自己的行动取得理论的支撑。但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化往往落后于生产领域的变化，旧事物的消失，新事物的成长必须有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旧的封建残余的影响，在相对闭塞的平峰山村仍根深蒂固，迟迟不肯退出历史的舞台，70%的农户仍保留祭神的神龛。

## 二、“文革”的冲击——“祖先神”向“领袖神”移易

当“文革”之风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平峰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冲击，而神龛地位及内容的变迁，成为这种冲击的外在表现形式。无论是被动的或是主动的，拜佛的神龛不复存在，神龛的位置已让位于毛主席像和红宝书，而成为厅堂正面唯一的装饰品。这一时期，平峰人的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文化主流是“祖先神”向“领袖神”的移易。

何谓“祖先神”？它其实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总沉淀。我国民间信仰中的“祖先神”既包括“自然神”又包括“社会神”。“自然神”是人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下，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而产生的对自然的崇拜，它包括对天地的信仰（如天神、土地菩萨等）、

对日月的崇拜（羲和、望舒、嫦娥）、对星辰的崇拜（北斗七星）、对气象的崇拜（雷神、雨神）、对山川的信仰（东岳大帝、龙王）、对动植物的崇拜（龙、凤、麟、龟等）。“社会神”是指承担某些社会职能的人格神，他们不同于将自然力量人格化的自然神，而是将社会职能寄托于神秘力量或历史人物，是人们企图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愿望而以幻想的形式来表现。它包括家庭保护神（如门神、财神）、地方保护神（土地、城隍）。平峰村神龛上所供奉的“天地君亲师”正表现出我国民间信仰中“自然神”与“社会神”包容其间的丰富内涵。

何谓“领袖神”？笔者认为，它包涵于“社会神”之内，或者说是“社会神”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定格。在“文革”时代，“社会神”定格为“领袖神”。平峰村有的农户主动在神龛上供奉毛主席像，乃源于毛泽东本人伟大的历史功绩使其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得以“神化”。此时，农户家的神龛上看似供了一个“人”，实际上却是供奉了一个“神”，或者说，是被“神化”了的人。有的农户在神龛上被动地供奉毛主席像乃潮流所致、大势所趋。当时，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氛围里，对任何神灵的信仰都已视为异端，“大一统”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此时，平峰村神龛上“祖先神”向“领袖神”的移易，是历史的必然。

“祖先神”向“领袖神”的移易，显然是一个文化的裂变与更新。“文化的自我更新是文化生命运动的表现，它并不意味着邯郸学步式的抛弃自我，以致无所措手足，而是在生命运动中不断通过自调节和被调节，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大化流行的勃勃生机，开创文化的新生面”<sup>[2]</sup>。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进步，或者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系统，只有在生命运动中不断实现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求得延续与变异、稳定与动态的对立统一。方能生生不已，昌盛繁荣；反之，则有可能衰落甚至灭亡。但现实与理想出现了极大的差距，“祖先神”向“领袖神”的移易，却是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个文化的全盘否定过程。不可否认，它铲除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使人们精神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但反过来说，这种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言论尚且不自由的情况下，毋庸置疑，人的宗教信仰和人的生存发生冲突时只能舍前求后，别无选择。但是，当我们深刻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外在强力的冲击也许可以改变文化的形式甚至内容，但却难以改变文化的本质，此时，平峰村农民的心中，仍然为“神”保留着一方净土，一种真切的信仰，只不过在外在力量的冲击下，信仰的形式已由“祖先神”转化为“社会神”。

### 三、改革浪潮的冲击——迷茫中的再度求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的春风，同样吹进了平峰的农家小院，没有强制，没有引导，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平峰的神龛又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许多农户家的神龛上又摆上了观音、罗汉等神佛。是否是一种信仰的简单复归，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循环往复，又回到了起点？根据作者在平峰村的考察看，答案是完全否定的。现代的神佛观与解放前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

(1)它是一种时尚而不是信仰。笔者访问许多平峰村的农户：“您为什么要摆放神佛，究竟相不相信神的存在？”90%以上的回答是：其实也是好玩，小商小贩挑进村来，和许多日常用品摆放在一起卖，大家都去买，反正也没有别的东西好摆，我家也顺便买一个摆到了神龛上。可见，现代神龛里摆放神佛，已不是出于一种信仰，而是出于一种从众心理，一种时尚。

(2)供奉对象多样化。汉民族的民俗宗教，神祇多样，佛、道并存。但具体在某一地方，主要神灵是基本稳定的。表现在平峰村的神龛上，解放前各家基本保持着上书“天地君亲师”及摆放神佛三尊的统一模式。但改革开放后神龛及现代神佛的复归，并没有特定的信仰对象。笔者曾经多次询问平峰农户：“您究竟信仰什么教派的神？”回答是：“不管什么样的神，随便摆一个就行，只要能保佑我家平安”。可见，现代的神佛观是兼容并包的，它并没有明确的教派，没有特定的对象，从平峰农户的神龛看，既摆放有罗汉、观音等佛像，也有三清、太乙真人等道教宗师；有八仙过海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有关羽、张飞等古代英雄；有“天地君亲师”等牌位、画像，另外还有百寿图、松鹤图等。总之，

平峰村的现代神龛表现出佛道合一，“自然神”与“社会神”并存的现象。

(3)只重形式，缺乏内涵。虽然“神佛”又摆上了平峰村的神龛，但与解放前家家烧香，户户拜佛的虔诚相比，平峰村民对现代的神佛完全是漠然处之，既不烧香，也不朝拜，传统的纲常伦理及宗教信仰已被百姓淡忘，现代的神佛已只是徒具形式而缺乏真正的内涵。

为什么平峰的神龛呈现出以上特点呢？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文革”结束，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破除枷锁获得精神的解放提供了宽松的大环境。其次，改革打破了“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制经济等形式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使人们开始追求个性的发展，精神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再次，经济发展、科学发达、交通便利，加快了信息的传播，而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又导致了观念的变化，衣食温饱之余，人们开始寻找精神上的寄托。

由此可见，现代的神佛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轮回，它似乎回到了起点，但这是一个更高的起点，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一种思想的进步，它表明现代农民正在迷茫中求索，寻找精神的家园。在这一求索的过程中，他们心理上充满矛盾、充满渴求、无所适从，旧的文化已被打破，新的文化尚未建立，于是，姑且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并非信仰的现代神佛。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 中国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于华东）